



思想周刊

观点

新论

思想者

文史

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自觉尊崇制度 严格执行制度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执行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是实现制度效能的内在需求与客观保障。

以安全生产为例,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制度,不仅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而且印发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可以说“直接将安全生产的责任落实到了人头上”。

然而,重大安全事故还是会不时爆发。可见,仅有制度而无制度执行力,其危害丝毫不亚于没有制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度没有执行力比单纯没有制度的危害更甚。实践证明,有制度而无执行力会直接影响制度自身的信用,从而引发人们对制度的“无感”甚至不信任。长久以往,难免会催生人们对执政能力和行政效力的质疑。

这样的情况在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防护、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也有所显现,不仅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法律的权威、制度的信用,也造成了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影响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再来看党内法规制度,党内法规制度是“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依托。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目的在于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强党的执政本领,加强党的领导。

然而,一段时间里,由于“重制定轻执行”的问题,一些党内法规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导致党内纪律松弛、腐败严重,不少蛀虫尤其是“大老虎”没有得到惩治。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项规定”颁布实施之后,党内法规制度以雷厉风行的态势得到严格执行,在管党治党方面发挥着日益明显的作用,不仅使党内政治生态展现出新气象,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而且由表及里、深入人心,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党员干部的行为,起到了净化观念、纯洁党性的效果,提升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党风、政风得到净化,也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有了显著改善。

下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然需要抓住制度执行力这个关键问题,切实破解制度执行不严、不力以及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情况。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主任)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

朱鸿召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深厚支撑”四个字,体现了党中央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新时代文化力量的殷殷期待。

文明是社会治理最高境界 文化是国家治理价值支撑

文化与文明,是描述人类社会进步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文明是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文化是国家治理的价值支撑。

一般来说,文化侧重于表达人的社会化过程,基本路径是人以化文、文以化人,把一个“自然动物”的人教化成为一个“社会文明”的人,其根本属性是价值观。价值观属于一种功能性存在,人们日用而不觉。但是,只要有选择,就会有取舍,从而见价值、分是非。文明则侧重于表达人的社会化程度状态,是文化教养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一种阶段性结果。

孔颖达注疏《尚书·舜典》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打个比方,在人类进化史上,如果不穿衣服到穿衣服叫文明,那么穿各式各样五彩缤纷的衣服就叫文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选择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走中

健全为人民靠人民执政制度

胡伟

日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战略部署,强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要求“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

突破古代“民本”思想局限

以往,我们比较多提的是“执政为民”。中国古代也有“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理念,至于“为民请命”“为民作主”更是历史上衡量善治和清官的重要标志。

但总的来看,历代王朝并没有真正做到以民为本。这不是想不想做的问题,而关键在于传统政治文化中缺乏“靠人民执政”的思想,也没有相应完备的制度安排。由此,人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贤人或清官身上。

现代社会,民主政治不仅要为人民执政,也要靠人民执政,而且要有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的制度保障。由此可以说,国家是人民共有的,政治是人民共管的,利益是人民共享的。

王程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有关说明指出,决定稿“体现了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保持定力和改革创新”的统一、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这“三个统一”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光辉,必将对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 总结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中国社会历史进步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面向未来,它既是对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继承,又不拘泥于已经取得的伟大成果,而是根据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的需要不断进行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具备现代

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民有、民治、民享”,因而也就无法破解“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这一重大命题。

把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有机统一起来,是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思想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是从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上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制度化实践。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我们党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并进一步孕育和丰富了民主集中制。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前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后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这一观念的确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认识的升华,突破了古代“民本”思想的局限,凝聚了现代民主政治的精髓。

汇集民智 凝聚民力 改善民生

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新时代,把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权为民所赋和权为民所用有机统一起来并加以制度化,正确处理民主与民本、民

东西丝毫不能改变;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遇到阻力和障碍时坚持改革的决心不动摇。要善于利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原理,勇于突破固有的体制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第三,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对关系又能牵引出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关系问题。一般认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政府与市场有着各自的边界,二者不能越位。但在实践中,这种思维常常遭遇困境,因为并不绝对存在没有政府的市场和没有市场的政府。从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的角度来把握二者关系,则可以一目了然。

问题导向对应着政府与市场的“分”,目标导向对应着政府与市场的“合”。政府与市场主体应当恪守规范化思维,按照各自主体行为的原则行事;同时,在目标一致性和价值同一性的前提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发力。

(作者为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治与民享、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的关系,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要把尊重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党治国理政全部工作之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要完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始终做到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引领群众,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要健全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推动人民团体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同时,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发展党内民主和实行正确集中的相关制度,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健全决策机制,加强重大决策的调查研究、科学论证、风险评估,强化决策执行、评估、监督;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首席专家)

东西丝毫不能改变;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遇到阻力和障碍时坚持改革的决心不动摇。要善于利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原理,勇于突破固有的体制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第三,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对关系又能牵引出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关系问题。一般认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政府与市场有着各自的边界,二者不能越位。但在实践中,这种思维常常遭遇困境,因为并不绝对存在没有政府的市场和没有市场的政府。从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的角度来把握二者关系,则可以一目了然。

问题导向对应着政府与市场的“分”,目标导向对应着政府与市场的“合”。政府与市场主体应当恪守规范化思维,按照各自主体行为的原则行事;同时,在目标一致性和价值同一性的前提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发力。

(作者为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葛天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城乡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10.64%;截至2018年,这一指标已经逼近60%。70年来,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7.2亿,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生活。

去年,一本获得卡赞斯坦图书奖的著作《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对中国城乡发展奇迹给予详细分析。该书作者在中文版序中写道:“这本书不仅是中国发展的故事;它讲的是人类发展的故事,以中国的历程为启示。”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城乡发展的伟大实践,将为人类发展提供更多样本和有益经验。

进一步来看,除了城镇化与大规模减贫之外,我们至少还可以看到中国城乡发展的三个深层次成就与进步:

第一,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一方面,中国城市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积极的梯度转移,出现了第三产业占主导的后工业城市;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生产方式正在经历巨变,传统小农经济逐步让位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第二,中等收入群体日益扩大。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向“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

第三,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实现飞跃式发展,推动城乡要素交换加速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为全面破除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提供了客观基础。

与此同时,初步形成了具备空间经济学意义的“城市三角形”,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华中、西南等地,构成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当然,在看到可喜成绩的基础上,也不能忽视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概括而言,这些挑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城乡融合的挑战。目前,中国的户籍城市化率估计在40%至45%,农村人口市民化的任务仍然艰巨。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到来,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着更高要求。特别是,农村生态环境污染、城市空气污染、能源消耗、固体废物处理、交通拥堵和社会老龄化等问题亟待抓紧解决。

二是城乡分配的问题。2012年以来,中国城乡家庭年收入基尼系数有相对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差距问题仍然值得高度重视。下一步,尤为需要抓住重点环节,完善治理制度和相关政策,合理调节城乡分配关系。

三是城市转型的问题。城市发展需要新模式、新动力,城市治理需要新理念、新思路。当前,全国层面的大规模城市开发和快速扩张时代已经远去,城市发展需要精细化治理,城乡融合发展需要“深加工”。其中,相关规划理念和技术方法有待大幅度更新、深层次变革。

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化治理思路固然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但不能完全解决城市治理中的关键问题,如公共参与、规划参与等。实践中,若运用不当反倒有可能带来风险隐患,威胁社会公共安全。这就需要在精细化治理的同时,进一步推动“敏捷”治理,对新技术的综合风险展开前瞻性研究,并加强监管、完善预案,提升系统应变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就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基本构成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政策网络,给新时代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从政策实施角度来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进一步把握:

一要注意理顺政策执行各个环节的衔接配合,重视政策方案设计和政策评估反馈。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市场和社

会的作用;在政策实施环节上,要更加注重激发市场和社

会的活力。在此基础上,对政策的中间传导环节及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让广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准确理解政策意图,并不断增强政策认同感,积极配合政策实施。

二要注重增长政策、分配政策等政策之间的平衡性和顺序性。

三要注重把握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在重视发挥城市的引领、辐射和带动作用基础上,要注重对乡村建设发展规律的深入研究,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来准确把握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由此,对农村土地制度和集体经济体制的改革,才能做到慎重稳步推进。

四要注重加强对新型城市建设理念和问题的研究。

对未来城市、智慧城市、智能城市、数字城市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有关理念的实践困境、发展瓶颈等关键问题,也应引起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一个基础性工作是,要更加切实地加强可行性的顶层设计与地方试验研究。

(作者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清华大学社会与金融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智库

城乡融合发展怎样「深加工」